

世界史研究的興起

◎ 邵東方 杜小亞

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家的視野

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經過利奧波德·馮·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及其同事和學生的努力，歷史從文學的一個分支轉變為科學研究的一門專業領域。當時歐洲的歷史學家深受正在蓬勃興起的民族國家 (national state) 的鼓舞和影響。例如，蘭克就強調說，歷史學家應當專注於國別史的研究。因此當他們從事歷史研究時，很自然地把歷史研究的重心放在民族國家的政治問題上，諸如立憲、外交、軍事、制度及政治家等等。在這種潮流之中，歷史學家便成了某一國別史，如英國史、法國史、或是德國史的權威。這種以民族國家為重心的史學研究對歷史學這門專業學

科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限制了歷史學家的視野。除此以外，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流行的歷史主義 (historism) 使得史學家熱衷於研究獨特的環境 (particular context) 而非普遍性的模式 (universal pattern)。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邁納克 (Friedrich Meinecke) 所說，「歷史主義的實質就在於用對歷史的個別理解來代替對歷史的一般化看法。」(《歷史主義：新歷史觀點的興起》*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1972年英譯版) 受上述傾向的影響，西歐的歷史學家實際上已經把對世界史的研究束之高閣。他們以為，世界史研究的範圍對嚴謹的學術研究過於寬泛。在他們看來，撰寫世界史的原則極易被後人拋棄，因此任何關於世界史

以民族國家為重心的史學研究對歷史學這門專業學科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限制了歷史學家的視野。

的著作都不可能名傳不朽。由此可見，近代西方的歷史學家大多缺乏世界史的觀念。

當代世界史研究的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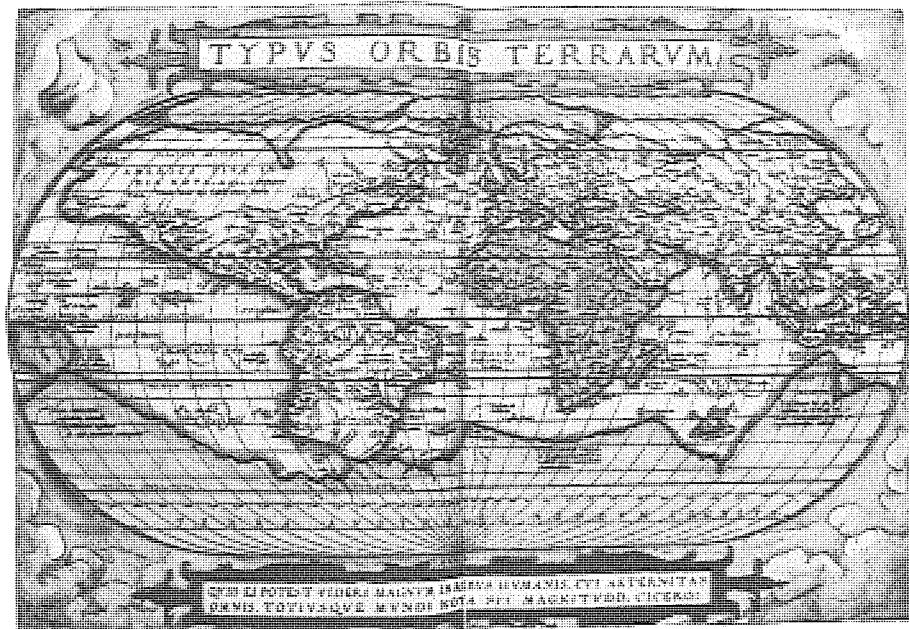
儘管如此，自本世紀初以來，仍然有少數西方學者在他們的歷史寫作中，努力擺脫民族國家歷史的局限。其中，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奧斯瓦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都曾試圖採用全球性觀點來撰寫世界史。現在，許多研究世界史的學者把他們奉為當代世界史研究的先驅。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學者威爾斯震驚於這場人類歷史上的大災難，開始注意到《聖經》一書把西方世界的人們聯合在一起達若干個世紀之久。因此他聯想到，應當

有一本新的著作把全世界的人們聯合在一起。他寫了《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0)一書，就是力圖達到這一目的。儘管威爾斯向讀者表明，他本人不是專業歷史學家，但是他這部著作卻真正展現了「地球與人類的歷史」。威爾斯主張沒有霸權、只有法律和義務的正義王國——世界國家：他認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人類便有繼續生存的希望。雖然《世界史綱》一書普及了世界史，但由於其中某些浮泛的理解和不甚準確的史實，以及它是出於業餘手筆，這本書長期以來不為一些傳統的歷史學家所重視。然而，威爾斯試圖把歐洲和非歐洲的歷史結合起來的大膽做法，對世界史研究來說是有開創性價值的。

文化悲觀主義(cultural pessimism)的思潮是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產生的。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德國歷史教員施本格勒於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沒落》(*The*

世界史研究的興起，
與歷史本身的發展息
息相關。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施本格勒認為，歷史是若干各自獨立的文化形態循環交替的過程。因此，他提出了世界歷史形態學(a 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概念。他說，各種文化就是各種有機體(organism)，世界史則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collective biography)。施本格勒批評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指出「世界史意味着整體，而不是某個被選擇的部分」。他主張「托勒密體系」(Ptolemaic system)的歷史，即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應當被歷史領域的「哥白尼發現」(Copernican discovery)，即多元的和無中心的世界史所代替。施本格勒認為，文化是所有過去和將來的世界史的基本現象(the prime phenomenon)。他關於多元文化的看法為湯因比後來構思《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1934-1961年陸續出版)一書提供了重要線索。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世界史的宏願在現代歷史學家中是人盡皆知的。他的《歷史研究》窮四十年之久才告完成，成為本世紀世界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針對史學家把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範圍的現象，湯因比認為「歷史發展中的諸種動力並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基於更廣泛的原因」。他突破了傳統史學研究裏國別史和斷代史的拘囿，擯棄了那些為當代歷史學家習用的範疇，如民族國家、現代國家、社會階級、工業化、勢力均衡等。湯因比指出，「為了理解各個部分，我們首先必須着眼於整體。」他把由二十六個文明組成的整體看作是歷

史研究的範圍。在湯因比看來，「歷史研究的最小單位(the smallest unit of historical study)」是一個個自成整體的文明。顯然，民族國家的歷史的範圍對於實現這一目的來說未免過於狹小。湯因比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認識的曲解，是對魔鬼的崇拜，是導致戰爭的因素。湯因比在晚年還主張組織世界政府，希望建成世界國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在剛剛出版時，並未引起極大的反響。不少歷史學家對書中的理論架構表示懷疑，對其引用材料的不够嚴謹提出批評。然而，即使是不贊同湯因比觀點的學者也承認，如果不重視湯因比的綜合性理論，歷史就無法重寫。近些年來，《歷史研究》一書對世界史研究的影響不斷擴大，其原因就在於湯因比的論點促使歷史學家擺脫狹隘傾向(parochialism)，從比較研究文明的角度去觀察和研究歷史。誠如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指出的那樣，「可以說，湯恩比以橫向地(horizontally)研究歷史的方式，突破了縱向地(vertically)研究歷史的傳統界限。」(《湯因比傳》*Arnold J. Toynbee: A Life*,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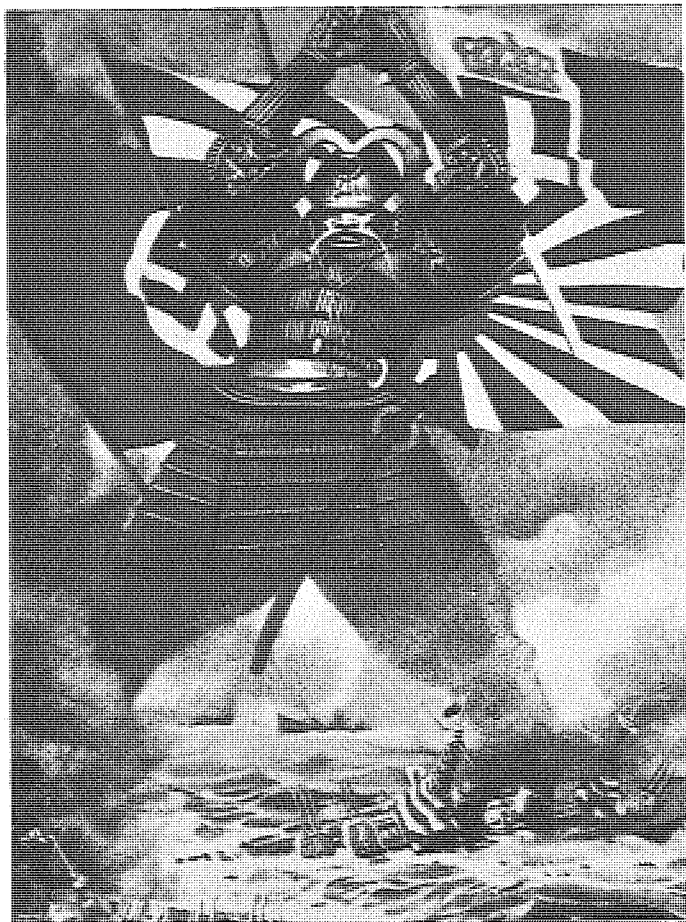
新時代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美國承擔起全球性的責任，其命運便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美國戰後對外政策的受挫促使美國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開始重視其他民族和文明的特點。另一

施本格勒批評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他主張多元的和無中心的世界史，文化是所有過去和將來的世界史的基本現象。

由於殖民帝國的瓦解，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興獨立國家都提出了各自的世界史觀。這些觀點及其傳統顯然是世界史研究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歷史學的研究方向。



方面，由於殖民帝國的瓦解，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興獨立國家都提出了各自的世界史觀。而這些觀點及其傳統顯然是世界史研究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於是在美國，對非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認識便成了當務之急，這反映出美國對1945年以後世界的全球觀念。一些西方歷史學家開始意識到在歷史研究中只注重民族國家的局限性。美國歷史學家菲利普·柯廷 (Philip Curtin) 曾警告說，歷史學研究正處在十字路口，其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史學研究發展得過分專業化。這種傾向造成歷史學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認為，解

決的辦法是通過不同專門史的有機結合，展開對世界史的研究（見《透視》*Perspective*，卷24，第1期，1986年1月）。在柯廷和麥克尼爾等人的倡導下，美國學者逐漸增強了對世界史、或說是跨地區歷史的研究興趣。不少歷史學家從對具體環境的研究轉變為對宏觀模式的理解。他們看到，要了解一個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方面日益增進聯繫和相互依靠的世界，就必須有一個更為開闊的參照系 (frame of reference)。這些歷史學家在研究中不再把自己的分析局限於國家的範圍之內，而是從更廣的視角研究各種具有世界性的問題，比如人口的遷徙、經濟的波動、氣候的變化、技術的轉讓、疾病的流行、環境的污染、帝國主義的擴張、遠距離的貿易、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傳播等等。在他們對以上各種問題的分析 and 理解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到了70年代後期，世界史逐漸形成為歷史學一個新的分支學科。一般說來，世界史是從全球共同體 (global community) 而不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對歷史進行分析。研究世界史的目的是為這個動盪的世界帶來民族和國家間的相互理解。因此，對歷史進行世界性研究的方法代表了現代史學發展的一個新起點。當然，世界史的研究並不是無所不包、面面俱到的，就像柯廷所說，「研究世界史並不要求學者具備所有的知識：與研究其他歷史一樣，它要求學者能夠具有在浩繁的資料中進行選擇和判斷的能力。」(同上)世界史不同於傳統的、側重個別國家和局部地區的歷史，它的

獨特之處在於它注重帶有全球性的問題、重視具有世界意義的發展變化、比較不同地區歷史的共性與個性，以及分析各種文明間的相互接觸。所以，世界史的研究能够使史學家達到一種「眼界無窮世界寬」的境界。

麥克尼爾的貢獻

這裏，特別需要提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教授對建立世界史這一史學新分支所作的貢獻。麥克尼爾從1954年就着手撰寫《西方的崛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 1963)，歷時九年方出版。近三十年來，這本著作在世界史研究領域影響頗廣。雖然此書參考了湯因比的許多觀點，但並沒有全盤接受他的思想體系，特別是他關於宗教是文明的基礎的論點。在這本書裏，麥克尼爾力圖從文化擴散的角度來理解全球的歷史。他的基本觀點是，推動社會的歷史性變化的根本因素在於各個文明與擁有新技術或不同文化的陌生者(stranger)，即其他文明的人們的接觸；世界歷史發展的動力就來自於這種同時代的各種文明的相互交往。在此之後，麥克尼爾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世界史的著作，如《瘟疫和民族》(*Plagues and Peoples*, 1976)、《人類的狀況：生態和歷史的看法》(*Human Condition: 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 1980)、《力量的尋求：公元一千年以來的技術、武裝力量

和社會》(*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1982)和《重要的交界處：現代的自由和等級》(*The Great Frontier: Freedom and Hierarchy in Modern Times*, 1983)。這些著作對世界史研究具有「典範」(paradigm)的作用。麥克尼爾在這些著作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世界史觀點。譬如，麥克尼爾構想出了描述各個文化和時代的中間模式(intermediate pattern)。然後，他再將這些中間模式聯結起來，形成一個全面說明「人類共同體的歷史」(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的「統制一切的模式」(overarching pattern)。麥克尼爾從歐亞大陸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從被「微觀的寄生依賴狀態」(micro-parasitism, 引者註：指自然界的生、植物等與人類的關係)與「宏觀的寄生依賴狀態」(macro-parasitism, 引者註：指社會的政治制度、軍事力量等與人類的關係)所包圍的人類生活環境中，發現了這種模式。他認為，這種「統制一切的模式」體現了人類進步的所有形式，包括精神與藝術、管理與技術的各個方面。麥克尼爾指出，人類社會變革的動力和持續不止是一個民族國家範圍之內的事。在空間上，它應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它則是無限的。麥克尼爾把世界看作是一個整體，試圖通過了解各文化間的相互接觸和交流去了解世界歷史。可以說，麥克尼爾是當代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創始人，他為新一代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者指出了方向。

麥克尼爾力圖從文化擴散的角度來理解全球的歷史。他的基本觀點是，推動社會的歷史性變化的根本因素在於各個文明的接觸。

麥克尼爾指出，人類社會變革的動力和持續不止是一個民族國家範圍之內的事。在空間上，它應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它則是無限的。麥克尼爾把世界看作是一個整體，試圖通過了解各文化間的相互接觸和交流去了解世界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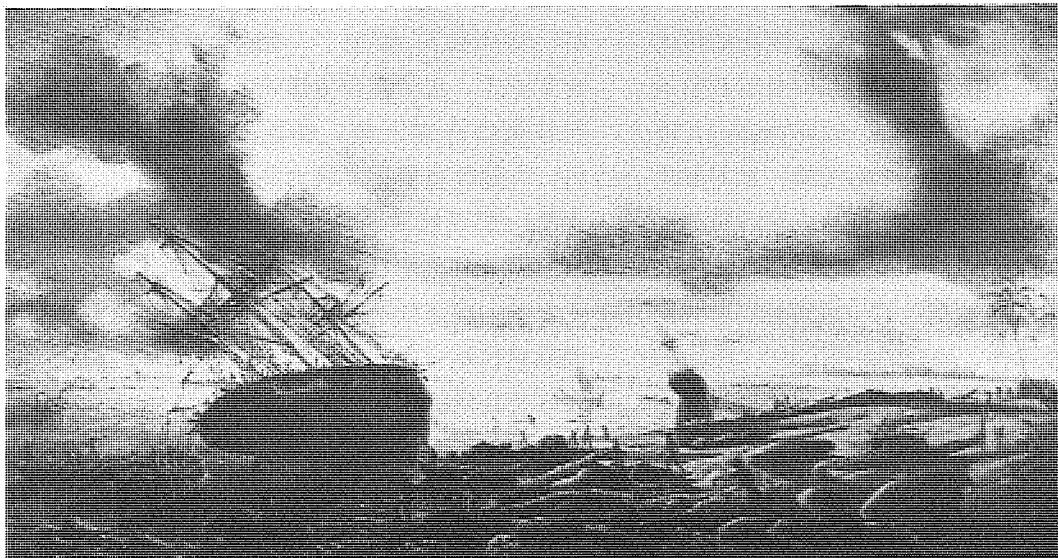
生態史與全球史

近年來，世界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新進展表現為許多學者逐漸重視對生態史(ecological history)或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研究。生態史的研究範圍包括地理環境、氣候變遷、植物區系、動物區系以及流行病傳播等與人類社會的相互影響和作用。生態史作為世界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體現在它強調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是歷史變化的重要源泉。生態史的研究使人們認識到，人類並非地球的唯一主宰，各種自然的因素也在不斷地對歷史的進程發生作用。只有通過生態史的研究，真正的全球史才能形成，因為整個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共存於一個生態系統中。美國德克薩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exas)的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教授被公認為生態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關於生態

史研究的主要著作包括：《哥倫布的交換：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後果》(*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1972)、《流行病與和平：1918年》(*Epidemic and Peace: 1918*, 1976)、《生態帝國主義：900年至1900年歐洲的生物擴張》(*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1986)和《哥倫布的航行、哥倫布的交換及其歷史學家》(*The Columbian Voyages, the Columbian Exchange, and Their Historians*, 1987)。克羅斯比用「生態的旅行包」(ecological portmanteau)一詞，即傳播複合體，來比喻近幾百年來歐洲的動植物、疾病等向美洲和大洋洲的擴散過程。他深刻地指出，近幾百年來的歐洲帝國主義擴張，不僅是政治、軍事的擴張，同時也是歐洲生態的伸展。因此，他的結論是，在近代史上，「美洲土著居民同時受到微小入侵者(micro-

近幾百年來的歐洲帝國主義擴張，不僅是政治、軍事的擴張，同時也是歐洲生態的伸展。

帝國主義的軍事擴張，同時也是歐洲生態的伸展。



invaders, 引者註: 指流行病)和大型入侵者(macro-invaders, 引者註: 指各類移民)的衝擊。」(〈疾病與大西洋民族的人口統計學〉“Disease and the Demography of the Atlantic Peoples”, 《世界史》卷1, 1991年第2期)作為1991至1992年度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歷史講座教授, 克羅斯比教授正在夏威夷大學講授從史前到當代的全球生態史課程, 並介紹生態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論。

美國現況

目前, 在美國一些大學的歷史系裏, 世界史已被列為研究生的課程。有的歷史系還把世界史作為取得博士學位的一個專業。為了推動和加強世界史的研究, 美國一部分歷史學家在1982年成立了世界史學會(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該學會現有會員一千一百餘人, 每年召開一次年會, 並定期發行《世界史研究簡報》(*World History Bulletin*)。中國歷史學家王敦書教授(南開大學歷史系)曾應邀參加過該學會的年會。該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世界史》(*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於1989年開始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1991年美國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Council of Editors of Learned Journal)授予《世界史》以新學術期刊一等獎(First Place Award of Best New Journal)。《世界史》編委會是由各國、主要是美國的著名歷史學家組成, 其中包括麥克尼爾、柯廷、克羅斯比、

瓊斯(E.L. Jones)和墨西哥女史學家瓦茲科思(Josefina Zoraida Vazquez)。中國歷史學家劉家和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和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郭穎頤(D.W.Y. Kwok)教授也是編委會成員。1990年第二期的《世界史》還刊登了拉夫爾·克羅伊澤(Ralph Croizier)的〈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一文, 介紹了中國大陸的世界史研究狀況和所面臨的問題。作為一份研究全球史的學術刊物, 《世界史》十分注意建立和擴大與各國史學界的聯繫。該刊主編傑利·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曾於1990年10月專程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師範大學, 並前往重慶參加了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的年會, 同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人員進行了學術交流。

1992年2月20日

邵東方 江蘇南通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學士和碩士。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美國東西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學員。

杜小亞 河北保定人。1982年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系。1989年獲美國夏威夷大學教育學碩士, 現為該校夏威夷、亞洲和太平洋研究學院助研。